

会的助力，避免其可能的隐患。在新的时代，中国外交面临诸多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从时间维度着眼，如何既保持战略定力，又能在中美竞争的态势中成功应对，这是当前中国外交需要解决的难题。

“中时段” 权力转移与意识形态^{*}

黄宇兴^{**}

权力转移理论讨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在何种条件下会由和平状态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既有理论对“中时段”权力转移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聚焦于国家层次，以崛起国或霸权国具有单一或多种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及其匹配情况解释“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权力转移容易诱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双方互动可推动和平的权力转移。笔者将以 1933—1939 年欧洲和 1965—1972 年印度支那的权力转移对上述理论框架做简要的说明。

一 “中时段” 权力转移及其结果

权力转移理论讨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在何种条件下会由和平状态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既有理论认为，在全球或地区层面军事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为霸权国，而军事能力位居第二且不断接近霸权国的国家为崛起国。根据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既有理论从体系和个人层面讨论了权力转移的结果。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道格拉斯·兰姆克（Douglas Lemke）从体系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全球或地区层面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相对能

^{*}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权力转移背景下的联盟研判”（项目批准号：2021THZWJC16）资助，特此致谢。

^{**} 黄宇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

力的变化对战争爆发的影响。^①与之相比，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和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引入个体认知作为解释性因素。^②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相对能力变化出现在每个权力转移过程中，但权力转移的结果可能是暴力或非暴力的。因此，崛起国或霸权国对形势的认知塑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既有理论遵循的分析层次暗含了解释因素在时间尺度层面的假定。体系层次的解释是“长时段”的。在体系层面，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间尺度以“十年”为单位。个人层次的解释是“短时段”的。决策者校正认知需要的时间较短，其时间尺度以“小时”“日”或“星期”为单位。决策情景往往为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爆发危机的情况。既有理论的推论是，体系层次和个人层次的解释因素分别对“长时段”和“短时段”的权力转移结果更具解释力。因此，在时间尺度层面，既有理论缺少对“长时段”和“短时段”之间的“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的解释。既有理论已经注意到了时间尺度对权力转移结果的影响，^③但仍未解释“中时段”权力转移的结果。

由此，笔者认为“中时段”权力转移的时间尺度以“月”或“年”为单位。其特点为，权力转移的时间尺度足够长，以至于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相对能力可发生变化且决策者可认识相对能力已发生变化。同时，时间尺度足够短，以至于相对能力变化足够剧烈且决策者的认知正误可对权力转移结果产生影响。

二 “中时段”权力转移中的意识形态

仅从体系层面或仅从个人层面解释“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是不充分的。由此，笔者重回沃尔兹提出的层次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包括体系、国家和个人层次。既有理论仅从体系和个人层次分析权力转移结果，而很少考虑国家层次的

①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8, pp. 363–375;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Peace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Ronald R. Krebs and Aaron Rappo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Time Horiz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3, 2012, pp. 530–543; David M. Edelstein, “Time and the Rise of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20, pp. 387–417.

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国家层次的要素比较复杂。研究者对国家层次的要素进行跨国、跨地区的理论抽象存在较大难度。另一方面,战争是否爆发取决于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互动。研究者仅从国家层次分析崛起国或者霸权国的政策难以充分讨论两者互动的结果。

尽管如此,通过国家层次分析“中时段”权力转移的结果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首先,国家层面的因素主要包含两类,一是强调政治体制和官僚程序的国内政治,即合法性在制度层面的表现;二是强调群体和个体的思想认识的意识形态,即合法性在观念层面的表现。^①国内政治一意识形态是决策者认识相对能力变化的背景性因素,也是塑造认知的“棱镜”。因此,国内政治一意识形态可沟通强调“相对能力”的体系层次解释与强调“认知正误”的个人层次解释。其次,国内政治一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可能在“中时段”内发生变化。这就使得研究者可通过国家层面的因素解释“中时段”内崛起国或霸权国政策的延续或变化。最后,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一意识形态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相互匹配情况并非某个国家的固有特点,而是推动不同国家在体系层面互动的因素。研究者可首先分别考虑崛起国和霸权国各自的国家层次的因素,之后对相关因素进行排列组合,从而推导崛起国与霸权国互动的结果。

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均围绕合法性展开。两者为国家层次解释因素的不同侧面,对国家领导人的认知和对外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发生同向强化的作用。与国内政治制度相比,研究者聚焦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建构更为便利。既有理论对国内政治制度分类比对意识形态分类更加复杂。这种分类的复杂性有利于研究者描述和刻画政治体制的差异,但不利于研究者对相关解释因素进行抽象。相比而言,研究者比较容易对一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进行刻画,且处于不同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国家及决策者的认知均有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者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层次解释的主要变量有利于在保持理论框架解释力的同时简化理论框架。

什么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意识形态是系统性的、影响最大的价值观。^②在对外政策研究领域,迈克尔·亨特(Michael H. Hunt)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信念或者假定,可以将复杂事务简化为易于理解的对象

① 黄宇兴:《崛起国如何研判霸权国结盟的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82页。

②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并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指导。^① 马克·哈斯 (Mark L. Haas) 认为, 意识形态是决策者对政治世界排序的偏好。^② 虽然上述定义侧重有所不同, 但是这些定义均承认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简化; 简化的方式具有系统性; 简化的影响具有持续性。

意识形态系统和持续地简化决策者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意识形态是决策者收集信息的工具。决策者的特定意识形态决定其对某些信息高度敏感, 而对其他信息并不敏感。第二, 意识形态是决策者简化分析的“棱镜”。决策者的特定意识形态决定其强调事态的某些方面, 而忽视事态的其他方面。第三, 意识形态是决策者进行合法认知的依据。决策者个人的思想及其所在的决策群体中可能存在多种竞争性的认知。意识形态使得某些认知合法性高于另外一些认知的合法性。在上述三种简化中, 第三种简化是根本性的。如果决策者及其所在的群体强调某种认知的合法性, 那么这种合法认知将决定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范式, 并且相关范式具有相当的系统性和持续性, 不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被轻易改变。

在“中时段”的权力转移过程中, 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 且有可能升级成为大规模武装冲突。因此, 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的组合可能发生三种作用。首先, 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 则崛起国和霸权国必然收集符合合法认知框架的信息并且从这种认知框架出发分析信息。这就使得双方均可能强化“竞争性”的认知, 越来越倾向于将对方视为“敌人”并固化这种认知, 从而诱发冲突升级乃至战争。其次, 权力转移过程中, 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相对能力不仅是变化的, 而且变化可能是剧烈的。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 则崛起国和霸权国均无法形成系统、持续的合法认知。这就使得崛起国和霸权国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范式具有不确定性, 从而难以形成关于“竞争必然升级为冲突”的敌对性认知。这可能推动权力转移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最后, 若崛起国或霸权国仅有一方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而另一方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 则权力转移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①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1, no. 1, 1990, p. 108.

② Mark L. Haas, "Missed Ideological Opportunities and George W. Bush's Middle Eastern Policies,"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3, 2012, p. 420.

三 “中时段” 权力转移的经验分析

既有理论主要聚焦于“长时段”权力转移或“短时段”权力转移的结果。前者讨论的经典案例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数十年里英国—德国、英国—美国关系的变化，后者讨论的经典案例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英国—德国、德国—俄国关系的变化。与这些案例相比，“中时段”的权力转移要求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权力转移变化以“月”或“年”为单位。因此，这类权力转移一般发生在地区层面。如前所述，崛起国和霸权国意识形态框架的单一性或多样性及双方框架的排列组合情况塑造了权力转移的结果。由此，笔者选取 1933—1939 年欧洲和 1965—1972 年印度支那地区的权力转移对上述理论观点做简要说明。这两个例子中均存在崛起国和霸权国的激烈竞争及双方互动中形成的重大国际危机。在前一个例子里，崛起国和霸权国均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在后一个例子里，崛起国和霸权国均依据多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因此，上述两个例子体现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取极值的情况。这两个案例的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1933—1939 年欧洲和 1965—1972 年印度支那的权力转移

	崛起国的 意识形态框架	崛起国的 政策选择	霸权国的 意识形态框架	霸权国的 政策选择	权力转移 的结果
1933—1939 年 欧洲	民族主义	军备 结盟	民族主义	结盟（法） 军备（英）	战争
1965—1972 年 印度支那	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	革命斗争 政治解决 危机管控	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	军事遏制 政治解决 危机管控	和平

欧洲的例子可分为两个阶段。1933—1936 年，崛起国和霸权国分别为德国和法国。1937—1939 年，崛起国和霸权国分别为德国和英国。这上述两个阶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均为民族主义。三国对外政策的内部分析均从本国民族利益出发。德国试图挣脱《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而法国、英国则试图巩固通过该条约及相关国际协定获得的影响。结果，三国均诉诸军备和结盟维护自身认为的“合法权益”。德国—法国、德国—英国的关系中的合作因素逐渐减弱，竞争因素逐渐加强，竞争关系逐渐演变成为敌对关系。敌对关系逐渐固

化，并在不断经历的国际危机中最终走向全面战争。

与之相比，在印度支那的案例中，崛起的苏联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苏联和美国的内部文件表明，双方分析彼此互动时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苏联将其盟友与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同时视为共产主义—殖民主义斗争和美苏争夺世界影响的斗争。苏联既通过政治和物质的方式支持盟友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又密切关注美国军事政策的方式和强度。苏联既推动印度支那的“反帝革命”斗争，又防止地区冲突演变成美苏（核）冲突。与之相比，美国将苏联对盟友的援助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同时，美国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非“铁板一块”。苏联及其盟友存在明显的民族利益差异。美国既要对苏联及其盟友采取军事遏制政策，又要利用苏联及其盟友的民族利益差异分化对手，更要防止地区冲突演变成美苏（核）冲突。因此，自1965年至1972年，苏联和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并多次出现双方可能直接兵戎相见的危险。然而，在整个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双方均始终强调政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必要性，且均努力管控美苏之间可能爆发的国际危机。

综上所述，崛起国和霸权国意识形态分析框架的单一性或多样性及其排列组合是理解“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的一把钥匙。作为系统性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不仅是决策者推行某种对外政策的动力或目标，而且是决策者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媒介，帮助决策者收集信息、简化情景并增强合法性。研究者在更微观的层次上理解意识形态对不同类别的对外政策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不同时间尺度下权力转移过程和结果的理解。

世界政治中的时间性与因果机制

叶成城^{*}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方法论等诸多领域都开始强调

*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